

國立浙江大學編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刊

本書據國立浙江大學1942年版影印

國立浙江大學文科學研究所叢刊第四號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

序言

徐霞客之時代

丁文江與徐霞客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問深之初步研究

江流索隱

江流索隱資料

讀徐霞客遊記憶浙東山水

讀徐霞客遊記中植物地理資料

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發現

大錯遺文霞客自述騎牛之貢獻

徐霞客之故鄉

徐霞客先生年譜訂誤

張其昀

竺可楨

章良炳

方豪

林文英

任美鑑

任繼鑒

黃秉唯

譚其驥

方樹梅

王維屏

方豪

序言

張其昀

正義明道，實求是原，為吾民族國有之精神，亦為古代賢哲治學之態度。此種精神實極適宜於科學研究。近世西洋人從事於中亞及印度一帶之史地研究及考古發掘者，莫不以玄奘法師所著大唐西域記等書為其嚮導。書中所述皆信而有徵，據以探索，歷驗不爽。故漢文典籍，信譽極高。徐霞客先生所著遊記，乃我國求是精神一種最高貴之表現。實客之遊歷，純然為學術上之興趣，既無使命，亦無其他目的。此種無所為而為之求知精神，即是科學精神。其隻身遠遊，探奇歷險，亘四十年，時人稱其健如牛犢，如猿。多方竭慮以赴之，其堅忍不拔之志，至為可敬。自滇南得病而歸，未幾即捐館舍，可謂以身殉其學。我國古代地志，詳於水而略於山。霞客於海內名山，既作個別深澈之探討，復有廣博周遍之觀察。當時雖無地形地質植物地理聚落地理等名稱，而霞客足迹所經，對以上諸項，均有透闡之分析。觀其所述與現代科學原理多可互資印證。彼之萬里長征，乃欲究明各山岳區域之相互關係與共同理解。故霞客實為我國山岳地理之開創者。於分析綜合二法，均所注重，分類研究與通論研究相輔並進，為其首趣所在。夫科學研究，事實之發明較學理之結論尤為重要。霞客遊記為其一生精力所聚，精微明晰，忠實紀錄，凡有旅行之經驗者，攜書對照，更為之驚歎無已。我國學者素重人格，凡偉大學者，均有勢。與霞客同時者，如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之於博物，方以智（著物理小識）之於物質，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之於工藝，米芾（著書）之於音樂，均有卓越之貢獻，而足表現其時代之精神，所可注意者，諸氏

學說似並未受明末西教士之直接影響，反而有自中國傳入西洋之事。關於此層，未載錯所發明，二等律流入西洋，利復居已有證明。參考霞客遊記所編著之中國地圖，在西洋亦甚為流行。惜自明亡以後，民族失其自由，學術遂致消沉，西洋科學此後則迅速發展，一長一消，深堪悲痛。西洋之科學方法、工具設備及研究機關之組織，現皆遠勝於我國。然科學種子必須由於內發，方為有本有源。苟種子優良，一旦植於適宜之土壤，與氣候，必能欣欣向榮。我國人認真研究科學，乃最近三十年來之事。近十五年來進步較速，而抗戰五年以來，民族屈辱之歷史已告一結束。民族之自信心，茲已完全恢復。此種心理上之轉變，極有利於學術研究。霞客先生精神不磨，昔賢家是之精神，皆為寶貴之種子。吾人在此抗戰，重成建國開始之際，舉行文獻家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頗感有深長之意義。

本篇為作者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遵義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舉行徐霞客先生三百周年紀念會之開會辭。茲值當日所宣讀之論文彙印為紀念冊之際，仍錄於篇首以作弁言。

徐霞客之時代

竺可楨

徐霞客名宏祖，江蘇江陰人，生於明萬曆十四年，卒於明崇禎十四年。本年適為其逝世三百年週期。昔潘次耕序徐霞客遊記，謂霞客之遊，途窮不憂，行誤不悔，暝則寢樹石之間，餓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侣，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寥寥數語，而霞客之為千古奇人，已躍然紙上矣。吾人編懷先哲為之作紀念也固宜。浙江大學自抗戰以來，屢經播遷，由武林而一遷建德，二遷蘆陵，三遷慶遠，四遷遵義與渭寧，是數地者，除遵義外，皆為霞客遊踪之所至。霞客曾至平越而渭寧原屬於平越州，且浙大由浙而轉而湘而桂而黔所取道徑，均與霞客無二致。故霞客遊記不啻為抗戰四年來浙大之遷校指南，此則浙大之所以特為霞客作三百周年逝世紀念，更另有一番意義也。

我國古代亦不乏遊跡遊方之士，如張博望使匈奴，班定遠征西域，此以立功而成不朽者也。晉法顯、唐玄奘之去天竺求梵典，此以立言而成不朽者也。若霞客者，既非如李文斯敦之宣傳宗教於異域，亦非如哥倫布之搜求瑰寶于重洋，霞客之遊，所謂無所為而為。人徒知其游踪之廣，行旅之艱，記錄之詳確，見地之新穎，而不知其志潔行芳為彌足珍貴也。霞客之欲作西南游，蓄志已久，徒以老母在堂，守古人父母在不遠遊之訓。遊記云：余志在蜀之峨嵋，粵之桂林，及太華恒岳諸山，若羅浮恒岳次也。然蜀廣閑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云云。及至崇禎九年，霞客為萬里遐征時，年逾知命，已老至不能待矣。以此知霞客之孝子其母。霞客西南之遊，同行者靜聞僧與顧僕，不幸靜聞在相遇盜受傷，卒于南寧，途次遭囑歿空骨塗，南歸足山下。霞客為迂道二千餘里，幾經危難，與顧僕分肩行李，經一年餘之時間，有

志竟成。辛屢靜聞骨于鷄足山下，以此知霞客之忠于友人。抵鷄足山後，彌僕乘機啟霞客所有箱篋，席捲而去。寺僧欲往追，霞客止之，謂道或不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于萬里之外，何其忍也。云云，以此知霞客待人接物之寬恕也。霞客在途，常患絕糧，但非義之財，一毫不苟。如崇禎元年，徒步三千里訪黃石齋于漳浦，當局假以旅資拒弗納，以此知霞客操守之謹嚴也。但霞客不但具有中國古代之舊道德，而亦有西洋近世科學之新精神。陳木叔霞客墓誌銘謂霞客常云：昔人志呈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即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歲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為崑崙海外之遊。近人丁文江遂謂霞客此種求知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文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游跡，皆非真知先生者也。

霞客生當明之季世，何以能獨具中西文化之所長？欲探求其理，則不得不審察霞客之時代。自嘉靖萬歷以來，國勢日蹙，不特倭寇屢擾海濱，強胡虎視漢北，即廟堂之上，宵小如魏晉輩竊據高位，頗東林諸賢、本程朱之學，操履駕實無論，在野在朝，均能守正不阿。霞客故鄉，偏近東林之大本營，而東林巨子如高攀龍、孫慎行等對於霞客亦以青眼相待。故霞客受東林之薰陶也必深，而其忠孝仁恕，知出天性，非偶然也。同時萬曆初年，意大利人耶蘇會教士利瑪竇來華，其人兼通與地天文醫藥之學，一時士人如徐光啟、李之藻輩亦樂與之游，無形中其影響且由教徒而傳播至非教徒。明末善作如方以智之通雅物理小識、宋應星之天工開物，皆渲染有西洋科學之色彩者也。霞客足跡遍中國，交游甚廣，覽當時西洋人所繙譯輿地諸書，矣。故知霞客之有求知精神，非偶然也。

在歐洲當時與徐霞客並世者有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開白兒 (J. Kepler 1571—1630) 與伽利略 (Galileo 1564—1642)。此三人者皆近世科學之鼻祖也。同時歐洲人遠渡重洋以經營殖民地於亞非美澳四洲，亦發軛于十六七世紀之交。1580年英國人所譽為海上英雄德萊克 Francis Drake 方環游全球，劫奪西班牙及大西洋各島土人之金銀珠玉滿載而歸。1580年即霞客誕生之年，英國人 Thomas Cavendish 率帆船三艘遠航印度洋，歸而組織東印度公司。不出百年而孟加拉、孟買、碼頭拉斯三省盡為東印度公司所轄治。東印度公司之巧取豪奪，更勢如破竹。迄今諸嚴又陵所譯斯密亞丹原富一書，尚可見其概略。

古人云：「為富不仁。」縱覽十六七世紀歐洲探險家無一不惟利是圖。其下馬者剽同海盜，其上馬者亦無不思攘奪人之所有以為已有，而以土地人民之宗主權歸諸其國君，是即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也。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險者在歐洲並世蓋無人焉。是則吾人今日之所以紀念霞客亦正以其求知精神之能常留于宇宙而稱不朽也。

丁文江與徐霞客

葉良輔

本校教授方豪神父告余曰：今歲為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能為文紀念否？張曉峰先生並為命題。吾師在君先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去世至明年將屆第六週年。丁師創辦之中央地質調查所成立已二十五年，將于本月在北碚開會紀念，余未必能往參加。此時作文以紀念徐霞客先生而不及在師，非不得計，雖不能文亦強應之。

丁徐二公可稱同志。章師演存鷗鈞前已言之。^{（註一）}原來丁先生和徐霞客確有不少相似之點，一生不避艱難，兩人相同。是第一點。霞客遊遍國中，尤以自崇曆十年至十三年，湘桂滇黔之遊為最久。丁先生前後入雲南凡三次，入川黔桂亦各兩三次，是第二點。霞客窮長江瀟湘郴灘諸水源和其他地理學上之貢獻，可和丁先生對於西南地質學上的貢獻，先後媲美，是第三點。最奇者，徐霞客攜和尚靜闇同行而靜闇遇病卒於南寧，民國十八年，丁先生組織西南調查隊，攜趙亞曾諸君同行，而趙君遇盜，瘞之於鷄足山。丁先生於趙君死後歸葬其骨，復說任其子教養，行必與俱，以至終身。兩人之義俠，古今罕有。是第五點。霞客和丁先生雖不同時，也算得同志了。但丁先生的推崇霞客，還有別的用意，他一面是為外國人常說中國學者不能喫苦，要借他一雪此言，一面要借一個好模範來勉勵一般青年去做艱險的工作。他的徐霞客年譜序說：「今天下之亂，不及明季，學術之衰，又復過之。而青年之士，不如自奮，徒藉口世亂，甘自暴棄，觀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自愧也乎？」這才把他的主意說明白了。然余尚有可以申論者，徐霞客遊記一書為習地學者所必讀，自丁先生為徐公編年譜之後，更不可不讀。丁先生因葉浩吾

受指示乃讀此書識其人，塲年譜所載徐公自幼聰穎，出口即成誦，搆管即成章，特好奇書，博覽古今史集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中華高蹈之蹟，可知于舊時史地之學，早有相當根基。十九歲喪父，先生雖出世家而父以布衣起家致富，先生祇要不慕榮貴，自可置身物外，專志獨游。廿二歲開始遊覽，迄五十歲廿八年之中，出游者二十年，足跡所至，尚在中州，而觀察事實之精微，記載之詳實，描寫之工，推分析現象之清晰，理解之正確，俱見諸遊記。因此當時雖無現代之地理學地質學，而其記述與推論，無不與地學原理相切合，例如崇禎元年先生遊閩南下漳平遊記云：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蒲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登入海上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黎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丁氏年譜云：黎嶺指建溪發源地馬嶺當即馬山嶺，沙溪與寧洋溪之分水嶺也。先生以二嶺距延平之里數，興建沙二溪之夷歧相較，而知二嶺之高相等，而馬嶺至海近，黎嶺至海遠，故寧洋溪流急于建溪，其卓識多如此。此中所推論者，即分水嶺之距海遠近，河道縱剖面之坡度與基準之關係，在近代地質學中雖是常理，而在當時已能體會得之，先生智慧之高，可以概見。

五十一歲先生為萬里遐征計，攜一僧一僕，漫游湘桂黔滇者四年。五十五歲返江陰故里，翌年正月卒於家，此行最大成就，為查明南北盤江之淵源，發見金沙江為長江之上游，興修鷄足山志是也。遇盜，絕糧，肩荷旅篋，僕死僅逃，受盡艱辛而竟其志。丁氏年譜云：時先生兄……弟……俱存長子……次子……已婚娶三子，十二歲孫三歲，家有遺產，衣食足以自給，百年已過，其半五岳已遊其四，文章更知子時人道德，見推于鄉里，常人處此必將尋孫謀子，優遊林下以卒歲矣，乃先生掉頭不顧，奮然西行，百折不回，至死無悔。此種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士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多年前，凡現

代科學家所仰慕所應具之美德先生盡有之矣。在師之推崇先生者無疑的首在於斯。良以專心一志吃苦耐勞觀察精細記載詳實為科學工作之第一步。

丁先生之為人與一身事蹟已詳于翁師詠寫文頤所作傳文(註二)茲節錄小段即可概見。先生之興趣甚廣其在科學經濟行政及政治方面之活動亦甚繁複。……先生才識敏捷聰慧過人故對於任何思想與事實之要點均能迅速把握。先生為一真誠之愛國者並極富熱誠凡所任事無不盡力以赴先生對於後進青年之鼓勵亦無所不至在其領導之下青年每能立定意志從事一生之事業。先生信仰科學至篤凡不含科學之一切思想及方法均極端輕視。……先生性極富政治興趣但從不盲從任何主義。彼所堅決主張者為政府應為有良心及愛國心之好人此種好人政府之思想為先生及胡適君於一九二四年所提倡所謂好人者先生之解釋亦甚注意廉潔及品格此點先生未行譙謹。……先生對於科學方面之寫作極為審慎除非已全部確信無疑者外絕不輕易發表。

丁先生之興趣雖廣而始終不離科學。因其所專修者為地質學故廿四歲游學返國即考察滇黔。其後又兩次考察西南。徐公觀察之真切有先生為之實地證明徐公經歷之艱險有先生為之實地體念志趣相同經歷相同又何怪乎先生樂為之表彰亦徐公之幸也。

徐公之為學既可為人師而徐公之為人亦多足稱焉。丁氏年譜云先生雖出世家然少年喪父且為布衣又不屑謁豪貴博名高研文遊者皆文學忠義之士觀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也。同遊僧靜閣病死南寧託先生埋其骨于鷄足山年譜云在途凡一年零二日兩次遇竊幾至絕糧住客缺夫自與額僕分肩行李然卒攜靜閣之骨瘞于鷄足以養人之不輕然諾如此。

丁先生之熱忱厚誠廉潔自持誠摯待人亦為吾儕受其薰陶者所不忘。丁先生學問興趣既寓

以致不能專精天又不假以時日享年四十九歲故其著述不及徐公之偉大精采為可惜耳。

註一 我對於丁在君先生之回憶地質論評一九三七年卷二三四頁。

註二 為中研院評議會作丁文江先生傳一九四〇年。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

方 豪

十餘年前余始讀徐霞客先生遊記，即疑其或曾沐浴西洋近代文明之薰陶。蓋霞客生當歐洲科學初入中國之際，晚徐光啟二十四年而生，去李之華之生亦僅二十一年。其逝世也在光啟後八年之藻鏡十二年，實當時人也。及民國二十二年，徐文定公光啟逝世三百年，吾友天津工商學院教授法人裴化行（Bertrand S. C.）撰「現代中國文化之前驅徐光啟」一文，趙石經譯，發表於上海聖教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者，云：

然其按指徐光啟與同時士大夫往來周旋之情跡，時人諸多不曉。惟地理家 John Smith 在其地理書上，註明中國學術發明之日期，而亦不及其詳細情形。近來新文化運動家丁文江先生，復詳論足今人敬仰之一大人物，名徐霞客者，一五八六年生於江陰，卒於一六四一年，為中國有名之探險家。其畢生所遊足跡，編成浙江、福建似與徐公暨耶穌會傳教士有所接觸，其遊歷之宗旨，實欲為中國打倒人所崇拜並據聖山之重大迷信。但 John Smith 曾依據其日記，以編纂其有名地圖，則此徐霞客之履歷，殊有討論之價值。不幸一六四四年之慘劇遂為學界懸一隔幕，而今日之智識界，只記得明祚不運所受滿清人殘酷之痛史而已。

張司鐸此文中可資研究者有二：一為霞客生前對耶穌會士之接觸，一為 John Smith 依據霞客遊記而編纂地圖。裴氏對前者未作肯定語，而於後者則言之鑿鑿，試先言後者。

一霞客遊記與衛匡國中國新圖志

R. MARTINS MARTINS, S. J. 漢姓衛名匡國，字濟菴，意大利人。生於一六一四年，萬曆四十二年，霞

客逝世後二年入中國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二）卒於杭州墓在武林門外老東嶽附近之大方井蓋指這
D.Priester S.J.入華耶穌會士利傳育衛氏輩傳近人馮承鈞節譯本無衛傳蓋原書所收凡四百八十四人馮譯則續五十人耳。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匡國被派赴羅馬報告傳教事宜乃自福建航海至菲律賓東荷蘭船至歐洲繞道愛爾蘭北部經英國而抵那威根遍道德比二國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在阿姆斯特丹印行「中國新圖志」拉丁原名作 *Novus atlas Sinensis* 原書余未寓目據費禡之所記其書為圖十七巨幅為文一百七十一頁故中國全圖一各省分圖十五附日本圖一又序言二十六頁略述遠東情形及各省疆域人口田賦民情特產植物古今地名工藝珍奇山河古蹟等為當時歐洲人有關我國著述中最稱詳備者出版後風行全歐有各國譯文多種匡國又為首創 *Sina*（支那）一字即奉之譯音者見洛佛爾 J.B. Lauter 著支那名稱考 *The name of China*（通報一九一二年二集十三冊七二九頁）所著拉丁文「韓靼戰記」*De bello tartarico* 於清軍入關及南下情形所記並詳直言六隱足補我國正史之闕略一六五四年（順治十一年）在比國蓋凡諾斯德國科倫意國羅馬同時出版次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法國里昂刊印法譯本蓋為歐洲第一部中國政治史也。¹⁰ *Sommervogel* S.J. 所著耶穌會士著述目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已黎出版稿「圖書中所有中國圖書採自廣輿記廣輿記述中國地理二十四卷成於十七世紀初葉（原書第五冊第六百四十七行接四庫收增訂廣輿記二十四卷清戚方炳撰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因明陸思陽廣輿記而稍刪補之大抵撮錄明一統志無所考正此云成於十七世紀初必指陸書而言也可知匡國全書乃本廣輿記而成其中一部分曾參考寶容遊記而已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匡國復來中國遺著有中文及拉丁文者多種當其去世之年（一六六二）猶在杭州刊印送友駕視利瑪竇交游論尤為廣泛蓋嘗好與士大夫遊者匡

國友多奇人，達文瑞居者，蘭谿祝子堅先生石，即善文詞而以醫術遊江湖間者，方以智淳山草集卷之四流寫其有示祝詩，光緒蘭谿縣志卷五文學有傳。匡國嘗於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設教堂於蘭谿，子堅即於是時奉教者。今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處藏有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蘭谿教友祝石等六人請第一任中國籍主教鄧文藻到蘭谿宣慰教友書，自稱已八十三歲。譯文載一九三三年寧波出版法文雙月刊第一二期。余藏辦學抄本稱匡國慷慨豪邁，狂誕無比，昔吳粵諺甚多名公鉅師咸尊仰之。帝一握手為幸。蓋與霞客之豪情逸興相彷彿。匡國雖不遇其人，而猶得讀其文，并用以為繪圖之助，非偶無也。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記匡國嘗至漳州並在某儒士家發現一舊拉丁文聖經，霞客友多漳州人，別匡國得見過記，亦自有因。蓋匡國《中國新圖志》一書必成於順治七年回歐之前，距霞客去世不及十年時，過記尚無利本，苟不與霞客家人或朋友有舊者，豈易獲得。天津工商學院藏有匡國之《世界廣輿圖》，二十六年一月四日該院出版專光四卷四十二期有攝影。明末清初教士所繪世界圖或中國圖，無稱廣輿圖者，亦可見匡國受廣輿記影響之深也。惜裝訂錯謬，應屬漳活，無從質證。二十六年春在杭州相值時，余便中亦未商榷及此，翹首北望，不自如其悲從中來。

衡匡國根據霞客之遊記而作輿圖，不愧為霞客身後之知己。霞客何幸而有此域外之友，裝化行嘗謂霞客或曾與當時教士接觸矣，則匡國之知有霞客遊記，或即得諸先來教士之介紹，否則，匡國初來華夏，遊記傳抄者雖眾，亦不易為新來遠客窺目也。艾儒略之卒於閩也，適在匡國自閩返歐前一年，或謂匡國所獲之霞客遊記即來自艾儒略手者，亦不無見地。故霞客生前與西洋教士之間，係實值得吾人加以探索。

(二) 霞客遊記與康熙時西教士測繪之中國全國

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至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天主教士奉帝命测绘中國全國衛國圖之中國新圖志即諸教士之重要參考書也。徐書與賓客遊記如有直接關係則康熙圖與賓客遊記之有關係保以亦無可否認但余以為二者間有直接關係亦屬可能繪圖教士之一輩者應即參看。此記曰善人時時以作一完善之輿圖為期每抵一省即不甚重要之城鎮亦必躬往勘視諮詢地方官及士紳查閱該城之史地圖籍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賓客旅館作遊記序曰名公巨莫不樂購其遺編時距繪圖僅五十餘年而遊記已如此風行當時教士係奉旨繪圖各省員司職員異常地方官與名人巨公必以此書遺也。

丁文江先生寶寧年譜曰如金沙江為獨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見也惜無繼先生而起者為之宣傳其文遂埋沒於蘇志及游記中直至康熙中派天主教教士製全國地圖時始再發見金沙之出路而歐人遂謂中國人未嘗知江之真源數典而忘祖亦吾國學者之恥也。以余度之西洋教士纂即據賓客所記而以之入圖非再度發見也。謂中國人不知江源者乃後世之歐人非當時繪圖之教士也。

平譜又曰岷江之分水鑄定山脈之來去與近世地學家言不全符合此乃十九世紀以前言山脈者之道為康熙中製中國地圖之天主教教士亦正犯此弊不足為先生病也細玩丁先生之語似繪圖教士與賓客共犯之弊為不謀而合寧知教士所繪者即奉諸賓客所記又安得而不同入歧途。

（三）徐賓客與西洋教士之間關係

吾人讀賓客遊記但見其與裨佑通談甚密余並疑其漫遊時或作僧裝也。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在富民縣寺和尚洞記曰余至此土人猶以為老和尚也顧絕不見其與西洋教士有何往還。蓋時

西洋教士有否關於霞客之記述。吾人孫隱寧間不敢置言。丁先生為霞客作年譜書，鉤稽詳悉，列舉霞客之友朋，與當時天主教人士周旋之跡。

霞客遊踪雖廣而交友不多，乃在此少數人中與天主教人有關係者得九人，即張瑞圖、何喬遠、曹楚坤、劉履丁、鄭之玄、張燮、陳繼儒、黃景昉、鄭鄧是也。瑞圖、喬遠、楚坤之玄、燮、景昉皆曾為先生王孺人秋園景機圖題跋者。喬遠又嘗為先生所建名宦張慎齋作紀序。履丁則為先生介紹錢謙益，而又與先生相遇於西歸之後，並算先生於江陰之馬連吉贈儒則為先生父母作傳，並為先生母作八十銘者。鄭鄧則先生自漳浦徒步訪之於羅浮，又訪之於常州者。鄧亦為黃道周贈先生詩作跋。九人中除張燮不能確認外，餘八人皆嘗與天主教教士或教友相識。霞客當利瑪竇至澳門後二年，教會傳佈未久，則此比例數已極可觀。霞客交友又多閩人，閩省閩教遠在霞客入閩前數十年，而當霞客第一次游閩後九年第二次遊閩後五年，第三次游閩前三年，即天啟五年（一六二五），西儒艾儒略字思及（Alfonso de la Corte）應董向高之邀，自杭州南下，止於福州，遍交省中名士。一時教務之盛甲於全國。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卒於延平。著《潛文書籍》極多，若《三山論學記》，則與董高析疑辨難之作，口譯日抄，別儒略及其他三教士與閩中士大夫談道筆記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閩中諸公贈詩抄本一冊（中文部一〇六六號），題「晉江天學堂輯，皆為贈天主教教士者」。吾友尚覺明先生達嘗以傳抄本見示，贈詩者凡六十九人，皆一時名流。第二第三兩首則張瑞圖、何喬遠所作，第六首曾楚坤作，第二十三首劉履丁作，第五十一首鄭之玄作，五人皆霞客良友。瑞圖、喬遠之玄皆泉州人，履丁漳州人，楚坤莆田人，又皆儒。教化最盛之地，據口譯，日抄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至十一年（一六三八），儒略所到地為福州、三山、福唐、晉陽、桃源、龍溪、仙谿、清津。